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丛书主编 苏长和

中国与国际 规则的制定

★ — 潘忠岐 等◎著 — ★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丛书主编 苏长和



中国与国际 规则的制定



潘忠岐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潘忠岐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ISBN 978-7-208-15899-3

I. ①中… II. ①潘…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中国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5365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

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潘忠岐 等著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39,000

版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899-3/D·3424

定价 62.00 元

丛书总序

为互联互通的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一套共同价值规范、制度体系、政策网络、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等，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在21世纪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一方面互联互通发展保持着强劲的势头，另一方面，阻碍互联互通的观念、制度乃至政策瓶颈依然存在。同时，世界在互联互通中出现许多从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因此，追求更好的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成为现在以及今后很长时期各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也为政治学、公共管理、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

基于这个考虑，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这套丛书主要探索两大问题，一是事关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非常广阔。就理论而言，较为迫切的问题是在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如何处理好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以往的政治学理论要么只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要么只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两者分属两个政治系统，似乎还没有一种能够很好地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贯通在一起的一般理论。现在，随着内外联动的加强，很有必要将两个政治系统打通。因此，在思忖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了解类型各异的国家治理体系，因为没有国家治理体系的支撑，全球治理体系必然如空中楼阁，而在建设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时候，也必须兼顾到全球治理体系，因为全球性问题长期不得其解，必然会对国家内部治理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关于全球治理的理论议题还有很多，例如全球治理与主权理论

发展、全球治理共同价值基础、国际制度体系的设计、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等等,都是学界长期进行研究但是仍有进一步探讨空间的理论议题。

在实践领域,全球治理的议题非常广泛,大凡各国在国内治理中碰到的棘手问题,同样也会以跨国的方式表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只要我们将各国政府下属部门所对应要解决的问题逐一排列开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开始越来越活跃在国际关系领域,例如法律、司法、安全、货币、经贸、税收、交通、卫生、水利、民政、民族、能源、环境、反腐、检验检疫、农林牧渔、文教、网络等等。所不同的是,国内治理体系中有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然而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行政体系一直阙如。这也正是全球公共议题治理的难点所在。上述几乎所有议题的治理一旦进入实践层面,都会提出政府间协调和政府国际合作效能的重要性。一些专业类国际组织在解决这类议题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也是不可忽视的。丛书中的一些作品在针对具体国际组织或者特定全球治理实践议题展开研究的时候,会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带来关于全球治理体系组织能力的经验思考。

这套丛书还要关注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卯榫相合的状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今日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管理者、贡献者,由此带来涉外事务、国际事务管理在我国国家治理中的比例迅速上升。可以说,中国既面临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同时也面临着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与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叠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来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探索出一条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合作共进的 mode 出来,将会极大地开拓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新的领域,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来自中国的理论方案,从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进步。就此而言,在关于当今世界一些重大政治理论的思想竞争问题上,中外学者实际上处于同一思想起跑线上。这套丛书将格外重视和鼓励那些致力于在中外经验比较中打通国内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

丛书既关注中国在具体全球议题治理中作用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方式和经验总结研究;既重视中国同既有全球治理制度体系关系研究,更会突出中国在制度体系建设中的创造性作用研究。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一些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应该未雨绸缪。例如随着国家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互动的加强,各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会延伸并交叉在国际领域中,中国也不例外。那些具备高效国际行动能力的政府,自然是未来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也是中国着力构建适应全球性大国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像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国际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政府在国际上行动能力提升、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地区治理、互联互通产品提供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如何把世界组织起来,让世界变得更有秩序,可以说是国际关系学科长期思索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世界的互联互通更加提出回答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中国与全球治理丛书”的初心所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国家重点学科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布局全球治理研究,目前形成了由若干个中心组成的中国与全球治理综合研究网络。这套丛书展现的并非只是复旦学者的成果,丛书是开放的,是不同学科围绕全球治理问题展开交流的一个思想平台,我们希望在中外学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共同办好这套丛书。

是为序。

苏长和

2017年4月22日

于复旦大学文科楼

序言 做国际规则的共同塑造者¹

陈志敏 苏长和

2015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出席“世界秩序与中国的角色——2015京城国际论坛”时引用了孟子的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她看来，虽然还不能说中国目前已经完全实现了“达”，但已经是时候该去关注和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了。而要“兼济天下”，中国需要尽快地想明白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的未来世界秩序应该是怎样的？它与现存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需要告诉世界，中国将在未来世界秩序的塑造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多年来，中国的学术界和外交界一直就是对国际秩序、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问题进行思考和研讨的先行者。在国外，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同样就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多看法。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同一条思想起跑线上。在现实的层面，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相继建立，“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四方响应，世界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板块正在出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移。也就是说，如果得到志同道合国家的支持，中国现在有能力来推动国际体系发生重要的变化。2014年11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进行了专题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些态势都预示着中国将在世界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扮演一个主动塑造者的角色，从而为推动建立一个和谐共生的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和维护者

中国既是国际规则的参与者,也是国际规则的维护者。所谓参与者,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维护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参与了西方主导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国际规则,并在维护规则中改革规则;所谓维护者,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一直就是主权国际体系以及通用国际规则的维护者。

中国参与西方主导的一些国际规则具有主动选择的特点。中国按照自己国内改革的节奏,逐步参与虽由西方主导但却具有较广泛适用范围的国际规则。因此,中国既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不加选择。将国内改革的节奏和进程与参与既有国际规则进行平衡和取舍,在保持国家稳定和独立性的前提下,使得两者处于可控而又平衡的互动进程之中,是中国参与西方主导的许多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经验。第二个重要经验是,面对既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中国通过参与和熟悉这些规则来改革这些规则,而不是通过打破这些既有规则来改革这些规则,有效维护了国际体系的和平和稳定。第三个重要经验是,参与这些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尤其是金融贸易类规则时,我们既要看到中国受益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国内成本。但是这些成本很多是中国自己内部消化的,很少外溢出去,这体现了中国一贯的节制和对外部世界负责任的态度。总之,中国是在保持内政和国际体系之间良性互动的背景下参与国际规则的,对两个大局、两种市场、两类规则的高度统筹平衡能力,是中国和国际体系相互受益的重要保证。中国选择了一种共生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处理好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以主权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和规则,中国则一直是坚定的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宪章》及其核心原则的坚定捍卫者,一直努力以自己的力量,并且与一切认同宪章主权原则的国家一起努力,维护宪章所体现的一些基本国际规则,如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等。这些原则虽然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但在冷战后受到了来自一些大国的多方面冲击。小布什时期美国一度试图

建立“新帝国”，西方以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名义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国与国关系中频繁使用军事干涉和武力威胁。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对有关国家的政策和行为进行了有力的牵制和抵制，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四次否决一些大国的干预提案，从而以一种建设性的否决力量发挥了国际规则维护者的作用，及时地维护了主权国际秩序的底线。人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以否定主权为前提；世界上的许多动乱和冲突，并不意味着主权失去意义，相反，很多恰恰是由于主权没有得到遵守造成的。主权制度和规则是共生国际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人类目前的政治认识和智慧，还没有发展到比主权更重要更有效的原则，来确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二、国际规则新的共塑者

随着发达国家陷入 2008 年以来的经济困难，中国在 2010 年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还没有充分作好各项准备的情况下，中国被迅速推上了世界的中央舞台。新成立的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和规则塑造的全球性平台，在其中，中国可以和其他大国共同参与国际经济协调和规则制定。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亚非欧沿线国家的发展等方面，中国已经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塑造者。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塑造国际规则的能力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但中国现在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将是国际规则众多塑造者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国这一日益凸显的新角色定义为国际规则的共塑者。这一共塑者的身份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 共塑者的继承性。在某种意义上，过去的中国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国际规则的共塑者。从参与者的角色出发，通过接受某些国际规则，以积极合作的方式，中国帮助实现了这些规则的再生产，参与了这些规则的塑造过程。不过，这种塑造作用是被动的，对规则内容的形塑只起到有限的作用，主要是扩展了这些规则的适用范围。作为另一

些规则的维护者,中国通过捍卫诸如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保证了这些规则在新时期的再生产,让这些原则历久弥新。但是,这类塑造作用是防御性的,目的是防止已有规则的内容不被其他国际力量改变和破坏。简而言之,通过认可某些规则,如可持续发展和贸易自由化,通过坚守某些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以选择性和防御性的姿态参与了这些国际规则的维系和维护。而且,遵守和坚守这些中国参与塑造的国际规则,仍将是 中国处理与国际规则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要更多地发挥国际规则共塑者的作用,不是要完全与过去的角色决裂,不是要放弃我们过去已经接受或者努力维护的国际规则,而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国际规则进行必要的完善和强化。

(2) 共塑者的塑造性。作为一个新的共塑者,中国需要发挥更加主动的国际规则塑造者的作用,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认可或坚守已有的国际规则上面。被认可的规则需要与时俱进,因而需要被重新塑造。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与投票权的分配规则已经日益与国家间的经济力量对比相脱节,急需改革来提升其国际合法性。要求改革上述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呼声一直存在,但一直缺乏推动改变发生的强大驱动力。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正在凝聚主导大国必须直面应对的改革压力。我们过去坚守的原则同样也存在与时俱进的要求,需要中国在内的各国去发展这些原则,适应一个不断变化中的世界。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把它理解为发展中国家无须承担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如今,中国已经承诺将达成对所有国家适用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此外,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地区和全球挑战日益复杂和艰巨,原有的国际规则无法导向有效的国际治理,而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国际规则来应对,或者需要另辟蹊径,发展新的国际规则来提供解决方案。因此,主动塑造国际规则将是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将具有更大的利益、更强的能力并受到更高的期待去承担国际规则主动塑造者的角色。

(3) 共塑者的共同性。要塑造新的国际规则,中国需要和其他国际行为体一起来合力推动。不论未来的世界是无极世界、多极世界,还

是中美两强遥遥领先的两极—多极世界,中国无法一家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而是需要与其他国际力量携手同行。在我们看来,从世界力量格局的走向来看,中国和美国无疑将是世界上的两个超大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即便如此,中美两国也需要和其他主要国际力量一起,才能建立具有持久性和合法性的国际规则。因此,任何国际规则的塑造都必然需要通过更多国家共商来进行,以促进规则适用范围的广泛性。

三、国际规则共塑中的协调战略和竞争策略

国际规则的共塑首先要求各国的协调与合作。二十国集团的建立和发展体现了各国协力应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合作精神。这样的合作在伊朗核问题的外交解决中也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可以说,国际规则的共塑,其包含的题中之意,就是需要各国奉行共商精神,采取协调战略。

但任何一种协调都意味着某种让步和妥协。在对现有国际规则的改革进程中,改革意味着建立这些国际规则的原有主导大国要更多地照顾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包括修改原有国际规则以及让渡部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

在二十国集团成立之初,西方大国对争取来自新兴大国的支持寄予厚望,在改革现有国际规则方面呼应了新兴大国的一定诉求,作出了一定让步,比如达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承诺在保持西方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权的前提下将一小部分决策权力转移给新兴大国。这一改革正好符合那些主张自由国际秩序的学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西方以前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本身有足够的生命力,不会受到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的背景下,西方所要做的只是转移小部分的规则制定权。但是,一旦经济危机的警报得以暂时解除,核心大国如美国就开始诉诸拖延战术,国会迟迟不愿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作出的改革决定,而美国政府也缺乏坚定的意愿去促使国会批准这一改革方案。总之,在一些重要领域,即使是西方自由派所主张的规则制定权的微小让步也遭到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反对和

阻挠。发达国家似乎失去了通过协调合作改革现有国际规则的意愿，拒绝或抵制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味地委曲求全已经失去了战略和策略的合法性。中国既无利益也无必要去挑战现行国际秩序，推翻通行的国际规则。但这并不表明，中国作为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和规则的重要国家，对秩序和规则中的不合理部分就会无动于衷，也不意味着因为某些大国对不合理国际秩序和规则改革的抵制而放弃推动改变的努力。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上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严肃地思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退化以及成员的退出问题。历史上，每到国际关系的历史转折时期，都会发生大规模退出既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进而导致已有体系和秩序衰落的现象。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发声和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退化的回应》一书中曾就组织退化和复原的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²在他看来，一旦组织制度出现退化，其成员产生不满，组织成员可以采取两类基本策略来促进组织制度的复原：发声（voice），即在组织内部表达意见，寻求组织领导层作出相应的改变；退出（exit），即从组织中脱离，迫使组织作出必要的改变。与此同时，他也分析了两种策略的混合运用，认为退出的可能性有助于强化发声机制的有效性。笔者在2014年发表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增量改进战略》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³文章指出，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采取“内线推动”和“外线拓展”的整合战略，一方面要在现有主导国际制度内以共识推动渐进改革，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声”策略；另一方面也要在现有国际制度之外，在被现有制度忽略或者现有制度无力治理的领域，在地区或多边的框架下发展与同道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建立新的国际制度。这些新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建立不等于也不是要从现有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中完全退出、“另起炉灶”，而是要证明中国和其他同道国家具有创造新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能力，目的是要通过新的制度和规则来补充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以增量方式来提升全球治理的能力，同时对现有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形成推动内部改革的外部压力。

因此，在发挥国际规则共塑者作用的过程中，中国要首先推动主要国际力量的协调合作，但也要认识到，一定程度的竞争也有其必要性。

在国际体系的改革进程中,人们应该鼓励而不是抑制增量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创新行为,只要这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国际制度和规则,有利于更好地应对全球和地区挑战,这类良性的竞争在今天的时代就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四、塑造一个共生的国际规则体系

中国已经度过了大规模参与西方主导国际规则的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同更多国家一起共同改革、完善和塑造国际规则体系的阶段。任何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体系,都不应该由哪一个国家说了算,而应当是绝大多数国家共商、共建的成果,否则将有悖民主的精神和原则。在一个权力不断转移和扩散的世界里,任何一方都无法依靠一己之力来垄断国际规则的制定,只有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协调合作,普遍和持久的国际规则才能得以形成并得到维护。不过,近年来的国际纷争表明,原有国际秩序的主导大国仍然试图维护其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要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际规则的未来走向。因此,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博弈在所难免,需要中国有所担当,奋发有为。但这样的竞争,其目的是要将有关国家推向国际规则共塑的轨道,而不是要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这是这个转型时代提出的艰巨挑战,需要学者们提出睿智的见解,需要各国国民有稳健的心态,更需要各国领导人有明智的政策指引和高超的外交技巧。

今天的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关系,不再是片面的“与国际接轨”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参与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问题,而是如何同世界大部分国家一起,共同构建一个以公正、合理、有效、有序的国际规则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否定国际体系中既有的国际规则,有些国际规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当然需要继承,但是不能适应更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发展、不能根据力量对比变化作出相应改革和调整或者在设计之初就有很多弊病的规则,则应当与时俱进,革故鼎新。一套国际规则体系,如果是强者立法、弱者守法,或者只有利于少数国家及其人民而不利于大部分国家及其人民,甚至使得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这都不是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国际规则。塑造一个共生的国

际规则体系和国际秩序,是人类政治文明向前以及向更高阶段突破的关键。在国内政治中,已经形成和积累了内部共生政治秩序的知识和成果,循此则可步入一种有序的政治生活,但是多数国家对如何营建一种共生的国际政治生活,似乎还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和约束。这也正是国际秩序和国际政治理论探索的方向之一。

注释

1. 原文《做国际规则的共同塑造者》最初发表于《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这里略有改写。
2. Albert Otto Hirschman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陈志敏:《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式增量改进战略》,载《当代世界》2014年第8期。

目 录

丛书总序 为互联互通的世界探索更好的治理方案·····	1
序言 做国际规则的共同塑造者····· 陈志敏 苏长和	1
第一章 国际规则及其形成机制·····	1
第一节 什么是国际规则? ·····	1
第二节 国际规则为什么重要? ·····	5
第三节 国际规则是如何形成和变革的? ·····	9
第四节 国家何以能够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 ·····	16
小结 ·····	21
第二章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	25
第一节 中国是古代东亚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 ·····	25
第二节 中国对古代东亚国际规则的贡献:礼治原则的 创建 ·····	27
第三节 中国对古代东亚国际规则的贡献:天下礼制的 推行 ·····	31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 ·····	34
小结 ·····	37
第三章 美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	42
第一节 美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实践与历史经验 ·····	42
第二节 比较中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	56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 ·····	62
小结 ·····	65

第四章 中国对当代国际关系一般规则的理念贡献	69
第一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9
第二节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73
第三节 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与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	77
第四节 和谐世界	80
第五节 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84
小结	87
第五章 中国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规范	92
第一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创新:体系层次	93
第二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创新:双边层次	96
第三节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规范践行:条件与障碍	100
小结	105
第六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	109
第一节 “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	110
第二节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规则制定权	114
第三节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面对的质疑与挑战	119
第四节 抓好“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牢牢把握话语权	124
小结	129
第七章 中国与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制定	135
第一节 国际危机及其管理的发展	136
第二节 国际危机管理规则迎来制定新时机	138
第三节 中国开展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经验	140
第四节 中国开展国际危机管理的规则主张	147
第五节 中国参与制定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机遇、挑战 与路径选择	149
小结	152

第八章 中国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	156
第一节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方向、博弈与路径	157
第二节 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领域	167
第三节 中国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173
小结	182
第九章 亚投行与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规范性力量	184
第一节 规范性力量的理论框架	185
第二节 亚投行与中国有关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规范	187
第三节 亚投行是中国在世界金融治理体系转型中所处 地位的试金石	190
第四节 亚投行与中国规范性力量的外部认知	193
小结	197
第十章 中国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的制定	202
第一节 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的建立途径	202
第二节 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利益及其演进	206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规则建立的有利与不利 因素	209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建立的经验	213
第五节 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规则制定的对策建议	219
小结	223
结论 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变革?	227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227
第二节 角色定位:稳健的建设性参与者	231
第三节 领域优势与重点领域	233
第四节 路径选择:多层次合作	236
第五节 能力建设:规制、创新与协调	238
后记	243